



病榻憶往—宗陶老人自述（三）

昌彼得 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十、押運善本來臺

押運善本來臺，是我第二次到臺灣。民國三十六年我曾來過一次，二二八事變後，政府大概也感覺到陳儀處置失當，派了一個文宣團來臺舉辦文物展覽作為安撫，派蔣慰堂館長為團長。這時故宮尚未復員，由中博籌備處提供器物，中圖提供善本，再邀集上海的收藏家提供書畫，在臺北省立博物館展出四週，四月中旬來臺，五月中旬返京。中圖派我，中博派周鳳森兄，我們兩人為佈展工作人員。往返都乘坐招商局的八千噸中興輪，住的是大艙間，伙食甚好，對我倆青年小伙子，可以說是開了一次洋葷。我們佈置展出後即無事，各借一輛腳踏車四處觀光，到過圓山動物園、龍山寺等地，到圓山去的中山北路上還有許多稻田；也上過陽明山，那時還叫草山。回南京後，我向沈老師報告此行的情形，那時剛伯師正為是否接臺大之聘而遲疑著，聽我說臺灣人民淳樸、社會安定，二二八事件已歸平靜，因此，沈老師接受臺大陸校長之聘來到臺灣。因沈老師之來，接著張致遠師、郭量宇（廷以）師也相繼來臺任教。我押運展品到臺不久，繆鳳林師也到達臺灣，我到基隆碼頭去接他。但此時臺大與師範學院已無教職空額，他待了兩天，又返回中大。不過，他的私人藏書已運到臺灣，由他南高師的同學張其昀代管，後來張其昀創辦陽明山文化學院，圖書館即是以這批藏書為基礎，現在仍存文化大學。郭量宇師後來帶王聿均、李毓澍兩學長籌備中研院近史所，來北溝聯管處搜集資料時，

我贈送他一份中圖善本裝箱油印目錄參考。黃彰健學長在中研院史語所研究，孫靜山學長在建國中學執教。臺灣歷史學的發展，中大歷史系是大有貢獻的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陳儀離職，由陳誠（辭修）將軍接任省主席兼東南行政長官。陳儀後因其弟通中共，被中央在漢口槍決，算是替二二八死難同胞報了大仇。三十七年時，中共為了圖謀臺灣，曾派了大量工作人員來臺，其中我所知的，就有中大歷史系的學弟兩位。這些中共潛伏份子，被政府逮捕，依陳主席之意，一律予以槍決，但傅斯年（孟真）先生向他建議，殺他們不如遣返大陸。二二八事件之釀成，原是捕捉謝雪紅等共謀，其中難免有誤殺而激起民變。一律遣送大陸，是最好的政策，不然若被有心人士利用，也許會釀成另一個二二八。

九月徐蚌會戰，國軍失利，南京震動，中央決定南京所貯文物即刻遷離。初議選擇精品運存美國，後決定以臺灣為復興基地，乃改遷臺灣。中圖接奉命令，我們特藏組同仁每天忙於裝箱造冊。十二月二十一日運出第一批的精善本六十箱，至下關海軍碼頭。等運送的海軍登陸艇一到，即聯同其他三機關的箱件運送上船入艙固定。這時聚集在碼頭的海軍眷屬們一聽此中興艦開往臺灣，大家一哄而上，頃刻甲板上即擠滿了人群，一幅逃難的景象。我一家三口擠在船上，只能蜷臥，不能伸腿。第二天清晨，史語所所長兼兩院常務理事的傅孟真先生前來巡視，見狀不大高興，頻頻以手杖叩地，咚咚作響。他叫我們稍

【特
載】

待，他到海軍總部找桂永清總司令，去去即來。不一會他轉來，攜帶一位軍官，下達命令，謂此是運送文物專輪，非押運人員一概不得搭乘，將所有海軍眷屬全部趕下船。傅理事與艦長商定，由艦上官兵勻出四間艙房，供押運人員住。我們四機關押運人員八人，則需每單位減少一人。中圖派的是我與採訪組的王省吾兄，我因舅兄任職聯勤總部科長，其家尚可暫住，決定讓省吾兄先行。其餘留下的，有史語所的高去尋（曉梅）兄、故宮的吳玉璋、中博的周鳳森。傅理事安慰我們，說會儘快的找第二批運送艦，倘短期無船，也一定用飛機送我們到臺灣。傅理事在民國四十年臺大校長任內，在省議會應詢時，因腦溢血而逝世。杭立武以為死無對證，他後來寫中央文物運臺記中卻說趕海軍眷屬下船，是他請他留英同學海軍總參謀長下達命令的。杭君是兩院理事會的秘書，又是教育部次長，是文物運臺的主辦人，本就有責任該來巡視。杭君有無來巡視，我未見到，也許他來過，或已曲終人散。但是，總參謀長是否有權下達命令，海軍眷屬是否接受他的命令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目睹的這一幕。杭君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的行徑，實令我不齒。

我們四人，約定每天上午在教育部碰面一次，打聽第二批的船期，並領取生活費。一直到十二月底，才有了第二批船的消息。第二批是教育部包的一艘招商局的海滬輪，海滬輪是客貨兩用輪，專行海上，比中鼎號登陸艦的平底船要平穩多了。我協助第二批押運員把善本書 462 箱運送到碼頭上船，一家三口就附搭這船到臺灣。船是三十八年元月三日駛離南京，這時南京尚是冰天雪地，溫度在零度以下；九日上午抵達基隆，則是豔陽高照，只能穿單衫了，初次領略到熱帶的滋味。因為已有第一批抵臺的同仁在碼頭照料，很順利將運來的善本書卸船，轉送到火車上，當天就運到臺中，存入借用的臺中糖廠倉庫。人員則住在距離車站不遠的合作旅舍，榻榻米房，適宜小孩嬉戲。元月下旬，蔣總統宣布下野，由李宗仁副總統繼任。月底第三批文物運出，但因李宗仁與中共和談，下令文物不得外運，所以就沒

有第四批。檢視這三次運出的文物，史語所的部分已全部到臺；中圖的善本也已運來，只是普通藏書不多，只有 150 箱；故宮運出二千九百七十二箱，只佔二十二年從北京運出的四分之一，但重要的文物大抵已來到臺灣；中博除了大型鐘鼎未能運出外，重要的也差不多已運來。我們三次運送，教育部都撥了大批的經費，都由中博的押運人員掌控，他撥出部分，借糖廠小火車旁振興路邊一塊土地，興建了辦公室一座及二十間宿舍，是木柱竹籬榻榻米屋。我們從合作旅舍搬入，算是有了暫時棲身之所。關於文物運臺經過，我在《故宮七十星霜》一書有稍詳的記敘，在此不贅述了。

十一、併入聯管處

李宗仁總統與中共和談破裂，戰端又起，政府軍節節敗退到廣州。李邀閻錫山組閣，杭立武運用策略，與閻勾結，將教育部長朱驥先（家驊）拱上行政院副院長，而自己升任部長。朱氏表面上看似升遷，實際上是奪其權。杭當上部長，做了幾件事。第一件是他在南京教育部次長任內，經手撥發了大量經費予三批押運員，這些經費都是由其所派中博押運員掌控，現在文物遷臺已停止，這些經費需正式報銷或繳庫。他派了一位主計人員來臺，與中博三批負責人密商，幾天後拿了單據回廣州覆命了。第二件事是修改故宮博物院的組織法，故宮自成立以來，一直是直屬行政院的，他於八月修訂章程，將故宮改隸教育部。第三件事是將遷臺的文物及押運人員合併成為中央文物聯合管理處。我們押運人員來臺，由於原機關未來，幾個月來都無薪水可領，只靠押運經費每月發給一點生活費來維持，現在成為正式機構，每月有薪水可領，對我們而言當然是好事。有了機關，還需要事務人員，杭氏就安置他的親戚同鄉，甚至他老婆的表弟也在聯管處任要職。聯管處設了一個管理委員會，杭自任主任委員來遙控，內設五位委員，為臺中市的陳宗熙市長、臺中糖廠的於升峰廠長、王世杰的姪子王德芳，此三人從未出席開會過。真正負責行政的是另兩個



委員，一個叫熊國藻，是王世杰的小學同學，人長得富態，大家叫他熊胖子；另一位是楊師庚，是杭的表弟，人生得瘦小，頸子好像隨時會折斷似的，大家喊他半條命。熊名義上是常務委員，實際上行政完成操控在半條命的手上。

聯管處分三個業務單位，即故博組、中博組、中圖組，各自掌管他們運臺的文物典藏工作。故博組的龍頭老大是莊尙嚴先生，字慕陵，經常一襲長衫，仙風道骨，大家尊稱他「老夫子」。民國十三年，馮玉祥趕走溥儀成立清室點查委員會時，他正從北大哲學系畢業，即進入故宮，參加清點工作，後來做到古物館科長之職。故宮所派的三批押運員共九人，各科的專家俱全，其中精於畫藝者，有劉鄂士、黃居祥兩位，可惜他們來臺後不久就因病去世了。那時臺中的醫療還不太進步，劉鄂士因胃出血而死，黃居祥是肝癌，而臺中省立醫院一直把他當胃病治療。他們兩位的臨摹、寫生與素描，我都見過，感到很好，他們的畫藝，應該不遜於後來的江兆申、李霖燦兩位。中圖六人，是李濟老口中批評的老弱婦孺，所以在聯管處時代，一直遭受杭幫的欺凌，王省吾及儲連甲二兄即因此憤而辭職，到臺北闖天下。我之所未辭者，因我離京時，蔣慰堂館長與屈翼鵬主任一再叮嚀，務必以善本書為重。

兩院一館的文物箱件，運臺之初係借臺中糖廠倉庫貯放，非久常之計。三十九年四月，在臺中縣霧峰鄉北溝村的山麓臺地建造倉庫三座，將糖廠的文物全部移入，中圖與中博合占一棟。接着，又在後面開挖防空洞一座，選擇部分精品以備空襲時存放。又增建宿舍八戶，中圖分得兩戶，但因人少，僅我遷入，另一戶作招待所之用。北溝係一小村莊，人口不多，多為農民，村中有雜貨店、理髮店各一，及一土醫生，生活並不方便，必需品需經常到霧峰或臺中市購買。村民大抵貧窮，穿的多是一雙木屐，無襪，冬天無禦寒之衣，多手提一竹製炭盆取暖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，到我遷離時，則已衣冠整齊了。九二一大地震後，聽說聯管處遺留下的庫房與山洞多遭震毀。

十二、中圖在臺北復館

蔣慰堂館長在三船圖書運到臺中後，曾來到臺中巡視，他希望能將藏書公開閱覽。我陪他去拜訪省立臺中圖書館館長，洽商合作事宜，但遭省館館長拒絕了。蔣館長後來到巴黎，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，三十八年九月回到香港，獲悉聯管處成立，發表的管理委員名單中竟沒有他。他心想回到臺灣沒有工作，生活成了問題，就停在香港找了一個私立學院兼任一點課，以資維持。蔣先生與杭在南京時同是朱驥先的部屬，照理說是應該和衷平共濟的，然而卻勢同水火，這其間的原委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他在香港期間，經常遭受中共特務如影隨行的脅迫他回大陸，他都拒絕了，以致精神上遭受很大的壓力。民國四十年，沈剛伯師知道他在香港的困境，徵得校長的同意，聘請他來臺大中文系教書。他返回臺灣後，我去看他，見他精神恍惚，身體消瘦。朋友們勸他信教，請一位神父施洗，此後他皈依天主教，精神才漸漸安定下來，經常去天主教堂望彌撒，甚為虔誠，至老不改。

三十九年三月一日，蔣總統復行視事，行政院改組，陳誠任院長，程天放任教育部長。程部長感到臺灣藏書不多，而中圖遷臺的十二萬多冊的善本書，若仍閑置臺中庫房非常可惜，乃於四十三年九月將中圖在臺北復館，蔣慰堂先生亦復任館長，將聯管處中圖組回歸中圖，原先離職的王省吾、儲連甲二兄亦回館復職。當年教育部撥給中圖的房屋，只有南海路日治時代的舊神社的幾間老舊房屋，存在北溝的善本一時尚無法北遷，我仍留居北溝照料庫房。我初任職時，是委任四級的幹事；押運善本來臺時，升為薦任編輯；改組聯管處後，改派編審；復館時，蔣館長派我為特藏主任，簡任八級。九年間由委任升到簡任，在一個公務員來說，算得上升遷極快的了。蔣先生復任館長後，精神日漸恢復，憑他的清廉與幹勁，盡量節省人事及事務費用，再向天主教會募捐，將舊神社房屋改建，成為南海路上一座巍巍莊嚴宮殿式的建築。這些具體事實說明，民國五十四年他脫穎而出被層峰圈定為故宮博物院院



長，決不是李濟老所說的「姓得好」。

杭立武自廣州來臺，已無公職，他手上尚掌握有一筆中英庚款基金，他利用此基金並向基督教會募捐，在臺中大度山收購大片土地，創辦東海大學，可說是他在主持文物遷臺外，對國家社會唯一的貢獻。他在與朱驩先先生公開鬥爭之先，已投靠王世杰門下，後來借王的關係出任泰國、菲律賓、希臘三國大使，政績平平。

從復館後到民國五十五年遷臺北，這十二年間是我做學問的黃金時段，既無行政雜務，也無應酬，每天的工作只是開一兩箱善本書在庫內吹晾，乘此機會，將在南京未經我考編的書，乘此機會盡閱一遍。本來我不敢編的宋、金、元本，現在奉館長之命，要出版圖錄，不得不仔細研究它們的版式、字體，以及刻工，對書中的收藏印記，也要試圖鑒別它的真偽。我看《元史》，見到有一篇傳，完全是依據他朋友送他的一篇贈序來寫的，因而悟到研究歷史不能僅僅依據實錄、正史等著作，文集是最好的史料，因為文集所載，不論是贈序、壽序、詩文序、奏議、遊記之文，都是當時人寫當時事。所以我主編《明人資料傳記索引》，收錄文集中的明人傳記材料，只是中圖所藏的明人文集太多了，只能選擇幾百種來考編。後來王德毅、程元敏編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王君編《元人資料傳記索引》，大體仍是承襲明人索引的體例。中館要出版善本書目，往年我不敢編的佛教典籍，現在也不得不借一部《大正藏經》的《法寶總目錄》，研究佛典的分類沿革。在我私人的研究工作方面，完成了《說郭考》、《明藩刻書考》，這都是在南京時已開始收輯資料的。又接繼研究《說郭》的作者陶宗儀，寫他的生平考與傳記，以改正《明史》記載的錯誤。這篇陶傳被富路特（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）及房兆楹主編的《明代名人傳》（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）所採用，還寄給我一百美金的稿酬。其實他們採用我的著作而譯成英文，我就是知道了也只有感謝，絕不會提出抗議，可見美國人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像臺灣的出版社，翻印了你的書可以不付一文版稅。在這段時期，我又選編了《明代版畫

選初輯》兩冊。中圖收藏的明代版畫書相當豐富，勝利後鄭振鐸（西諦）先生任中圖編纂，駐上海為中圖收購善本，鄭先生喜歡版畫，所以收購的以版畫書為多。加上抗戰期間中圖在淪陷區蒐購的善本，以吳興劉承幹嘉業堂及張石銘適園散出的為多，其中也有不少版畫書。可惜我後來離開了中圖，未再繼續選印，希望現在國圖的工作人員能繼續補編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與續選版畫出版。國圖出版了《善本書志》，固然很好，但不要只知資訊化，而忽略了研究的工作。

我住在北溝期間，見到了聯管處兩幕有趣的事。劉鄂士、黃居祥去世後，聯管處遞補了兩位職員，一位蔣雍，一位胡志偉。胡君臺大四十八年歷史系畢業，與最近要籌組聰明人黨的李敖大師為同班同學。他兩人是出了名的文武兩狀元，李大師喜歡寫文章調侃人，雖老師亦不免；胡君則是武狀元，一言不合，即舉拳相向。一天他與蔣雍大打出手，在地上翻滾，工友在旁恥笑，聯管處請他辭職。他到大甲中學執教，也是與同事打架而離職，這種動輒打人的人，沒有學校敢聘他，他只有跑到臺北南陽街教補習班，聽說成了名師咧！胡君離職後，聯管處又遞補了一位顧君（忘其名），也是臺大畢業的。顧君風度翩翩，頗為瀟灑，主任委員何聯奎非常喜歡他，一直想找機會保送他出國深造。顧君因是一表人才，享有齊人之福，但那時公務員收入微薄，那能養兩個家，出於無奈只有實行「拿」之一途，我不說偷，因為白天曰拿，夜間才叫偷。聯管處經常有外國學者來研究藝術，他們所帶的照相機經常不翼而飛，只有自認晦氣。其時李學智正為史語所來故宮攝照舊滿州檔，帶來史語所照相技師張秋濤攜帶機具攝製微捲。大概每隔幾週來攝照一次，工作約五、六天。張君第三次來攝照時，攜帶了一具史語所新購的徠卡照相機，當時此機甚貴，進口的也少，不知是他想照北溝的風景或是炫耀。帶來的第二天，這台徠卡相機就不見了，警局派員調查也無結果。因張君在史語所早有不良素行，於是警察推定是監守自盜。史語所要張君賠償，每月從其薪津中扣除若干。張君既遭錢財損



失，又背惡名，心有不甘，他斷定竊盜者不是自用，必定出售，於是他經常到臺北各拍賣行暗中查訪。一天他發現一家拍賣行有出售徠卡相機，他一驗其上的號碼正是史語所進口的，於是報警查詢拍賣行老闆，知是臺中顧某所寄售，案情大白，何主任委員將顧君開除了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發動攻擊金門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二三砲戰。共軍多次登陸失敗，毛澤東失利，跑回北京，大搞三反、五反、文革、清算鬥爭，鬥垮二號頭目劉少奇、林彪等人，以安其內。臺灣在此次戰役之後，獲得了安定，發展經濟，鼓勵學術研究，調駐美大使胡適之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。胡先生有時陪同外國貴賓到北溝庫房觀畫及瓷器，胡先生對此等藝文興趣不高，常到我的庫房看善本書，或聊些有關書的問題。他說回臺後感到最苦惱的事，是沒有書可看。我說傅斯年圖書館藏書很豐富，怎麼說無書可看。胡先生說他們只有卡片目錄，他沒有時間去細細的查，他要看的不是某一部書或某人的著作，而是要像四庫書目了解它的大概內容，知道有無他需要的資料。我認爲臺灣的藏書總量雖不甚多，假若有一部聯合書目就大家方便了。那時胡先生仍在撰寫他的《中國哲學史中古篇》及研究《水經注》的問題，大概他把我的建議回去告訴了史語所李濟之所長，濟老找蔣館長要他主編臺灣公藏善本及普通本線裝書的聯合書目，濟老手上有一個由哈佛基金成立的中國東亞學會，可以提供編目及出版的費用。蔣館長命我主持推動其事，我曾邀集各館的負責人商談，開了兩次會。因各館工作人員所受的訓練不同，假若要一致用四部分類法有很多的困難，也曠日持久，最後決定各編各的。所以後來出版的善本及

普通兩個目錄，雖名曰「聯合書目」，其實是聯而不合。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目錄，仍是用杜威十進分類法，假如胡先生未去世的話，恐怕還是不會感到滿意。

在北溝期間，蔣館長先後派文崇一、徐玉箴、王德毅三位來協助我，只是鄉間沒有娛樂，三餐尚須自炊，年青人不耐苦寂，待了長則一年，短者半載，相繼辭職了。民國四十八年間，館中派了一位軍中退伍的中年人侯君俊德，此人老成忠厚，工作認真，就待了下來。因庫房照顧有人，我就不願再與杭幫人物比鄰而居，就搬家到臺中市，雖每天上下班辛苦些，但小孩上學比較方便。從家到北溝並不遠，不過十公里左右，只是無論乘小火車或公車均需轉一次車，且須再步行二公里上下，花費的時間長，爲此我乃覓一交通工具。這時臺灣工業才剛起步，摩托車都是進口的，價昂買不起，我以新臺幣三千八百元購一自行車，加裝一具馬達，時速大概只有二、三十公里，好在不遠，半個小時左右，就可到達。此車與引擎頗耐用，一直用到民國五十五年北遷，才廉讓於村民。

臺灣光復早期，書店不多，所出售的多是日文書。我編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時，想買一部《明史》，備置案頭隨時劄記之用，竟不可得。所以常勸出版界的朋友，多出版點中國古籍。後來商務印書館在臺再版了《四部叢刊》、《四庫珍本初集》，中華書局再版了《四部備要》，古籍漸多起來，我乃勸朋友多選印些臺灣罕見的珍本。我記得曾選了中圖所藏善本中宋、元、明藝術家的文集，請學生書店的經理劉國瑞兄影印，這時臺灣研究藝術的風氣很盛，中圖所藏的多是罕見的珍本，聽說出版後銷路很好，不久就再版了。